

闽派批评的历史

文/郑海婷

郑海婷,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闽派批评”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地域文化的视角观之,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早已形成“闽人善论”的评价。

一

现今对于“闽派”的定义,无非是两个标准:一、地域,也就是在福建发生的各类文学批评,参与者涵纳在福建生活工作的本省籍和外省籍的相关人士;二、人,也就是由福建人所作的文学批评,参与者包括所有福建籍的批评家,放宽一些,也可包括祖籍福建的批评家,而不限其所处地域。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取最大范围,“闽派”既包括闽地文论也包括闽人文论。

以此标准来看,“闽派批评”早已有之。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开发较晚,但自唐五代以后,各地多有战乱,福建则能偏安一隅,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局面,北方民众大量南迁,使得中原文化与福建当地的闽越文化相互交融影响,学风日盛,科教兴旺,科举进士者甚多,福建逐渐以文化发达闻名,《八闽通志》曰“闽自唐神龙以后,举进士、举明经者接踵而起。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其中,文学批评不仅是“福建文学发展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文体”,也是福建文化的重要名片。

二

确实,纵观唐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福建人的身影层出不穷,他们敢为天下先,倡导或参与了绝大多数的文学思潮和活动,几乎在批评史的每个阶段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清代郑方坤的《全闽诗话》写道:“自唐宋至今,千数百年,其间骚人墨客,

胜事美谈,不可胜数。”中唐晋江人欧阳詹是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一名干将,在散文理论方面亦颇有建树,是福建第一位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晚唐泉州开元寺僧人释书端的《艺苑搜隐》引闽地诗话风气之先。

宋代,浦城人杨亿是西昆体诗派的领袖,其“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的创作主张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崇安人柳永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是两宋词堂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通过以赋为词的方式,促成了词的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嬗变,从而使发轫于晚唐民间的慢词得到长足的发展”。邵武人严羽的《沧浪诗话》首开以时代论诗的先河,暗示诗运有关国运,主张以盛唐为法,主张“妙悟”,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建安人魏庆之(一说为建阳人)的《诗人玉屑》、莆田人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福清人敖陶孙的《敖器之诗话》等均是诗论佳作。

元代浦城人杨载,是“元诗四大家”之一,诗论上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儒学传二·杨载》),诗话著作《诗法家数》进一步推动了“崇唐得古”的风气。

明代堪称福建古代文学的高峰,创作与批评互相促进,成果丰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指闽派)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模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中国文学通史》“明代文学”卷写道:“真正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全局影响的是闽派。”“其影响就体现在提倡盛唐上。”“闽中十才子”之一的长乐人高棅提出“诗必盛唐”,多为后学引用。建安人杨荣是“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作家,他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实际主持文坛二十二年,作为台阁重臣,杨荣平正雍容的诗风直接影响了从永乐到万历年间的诗歌创作。晋江人王慎中反对拟古主义,主张文崇唐宋、文从字顺。小说理论方面,晋江人李贽极富批判精神,以异端自居,号称“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提出“童心说”,是风行一时的学术明星,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所作的评点沿用至今。长乐人谢肇淛“是在《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期间唯一的著专文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他的《〈金瓶梅〉跋》是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清代,闽县人叶矫然的《龙性堂诗话》“博参古今而超然自得,旁涉宋元而畅其趣”,在康熙诗坛宗宋之风未兴之际,能够留意宋诗,十分难得。侯官人梁章钜一生共著诗文近七十种,尤其在楹联创作和研究方面贡献颇丰,著有《楹联丛话》,是我国楹联学的开山鼻祖。侯官人林昌彝有《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海天琴思录》及《续录》各八卷,在评诗论诗之外,还密切关注时务,对鸦片战争、赌博、禁烟和基督教的传播等等都有论述。长乐人谢章铤被称为“闽越巨子”,著有《赌棋山庄词话》,论词主张主性情、重音律、宜雅趣,其“词主性情”说对当时词坛颇有影响。近代,统治晚清诗坛的“同光体”诗派,其领袖是来自福州的陈衍和郑孝胥。陈衍《石遗室诗话》是晚清诗话集大成之作,对同光体诗人的主张做了系统的总结与发展。陈衍的“力破余地”论、“三元”说、“学人之诗”说被认为是传统诗学的最终章,对传统诗学具有总结性意义;他关于诗是“寂者之事”“荒寒之路”的说法也反映了清末民初最后一代士大夫面对王朝废亡和古诗将王的凄凉心态。

三

在旧学与新学地位更替的过程中,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闽籍学者对新学的推动,从而促使我国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转换。

清朝时福州人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名垂千古,他虽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却持开放的态度。他是第一个放下“天朝大国”心态,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清朝大员。他和幕僚编译了《海国图志》(原为散篇,由魏源编辑成书),介绍西方的地理、历史、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启发了晚清的洋务运动,被称为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另一位福州人严复是我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振聋发聩地喊出旧学“无用”,“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和具有新价值的文学即将或正在生成,预示着文学和文学思想时代性转折的开始”。严复认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救亡决论》)他指出,以八股文为代表的旧学不过是“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在此封建专制手段之下,“民力因之以日羸,民智因之以日衰”(《论世变之函》)。严复翻译介绍了进化论和群学论,大力倡导格致之学,主张以学问“开民智”,经世致用。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通过翻译《天演论》《原富》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巨作,系统地将西方先进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其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和“且演且进,来者方将”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社会各领域改良革新的理论依凭,对我国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带动了此后的文学变革和转型。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系统总结了严复的进化论、民主论和自由论对现代文艺学的三大贡献:一、“进化论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发展观,成为文学变革思想和‘文学界革命论’的理论基础”;“它也是现代文艺学中‘文学发展论’哲学基础的构成成分”。二、严复提出的“开民智”论“成为对文学的新要求和创作新宗旨,开始实现文学功能内涵和价值标准的转换”,“是从19世纪‘经世文学观’到20世纪初‘文学新民说’的过渡”。三、严复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近代自由论,“为文学创作、文体解放,也为文艺学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这些近代思想对现代文艺学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构成新文学观或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基础,甚至决定着它们的时代特性和基本的社会属性。”严复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为现代文艺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单从小说理论来看,不论是传统的小说评点,还是现代的小说论文,福建文人都可称先驱。如前述明代李贽和谢肇淛二公。李贽极富文学自觉意识,他首先突破了文体的外在标准,不以文体区分作品优劣,而以是否具备“童心”这种创作本身的因素作为标准,从而把小说、戏曲这样“不入流”的体裁抬高到和经、史、诗、文一样的地位。李贽写道:“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

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①文体区隔的打破,使李贽能够对新兴文体快速做出反应,创造了新的批评领域。但是,李贽的小说戏曲评论仍然还是依附于文本的评点,不算独立的小说理论。我国第一篇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论文的作者是严复。拒绝“旧学”之后,在“新学”中,严复首推的文学体裁是小说,他认为小说体现了人类的“公性情”,是人性的表现,在思想教化方面的作用无可出其右者,革新小说,可开民智,这是对以诗为正宗的古典文学理论的颠覆。严复发表于1897年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我国“第一篇近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论文,也是第一篇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引入中国文艺学的论文”。具有用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理论先于创作的自觉意识,摆脱了此前小说评论跟随小说、依附小说的状态。这篇文章已全面涉及后来小说界革命的各项主张,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小说论述更为深入,涉及了小说的教化、艺术的本质、文学虚构、小说的地位等许多基本问题,“并在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已属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此文已孕育了近代小说学的粗略构图”。^②同样来自福州的林纾被胡适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以其180多部“林译小说”开我国西洋小说翻译之先河,为新文学培养了众多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促进了新旧文学的过渡。林纾从对小说社会功用的期许出发,推崇如狄更斯这样能够针砭时弊的小说家,在近代作品中则推崇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因为唯有认识到己身之不足并加以改进,才有强大的可能。他写道:“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③林纾用他的翻译小说最大程度上响应并助力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小说济世救人的思想,康有为评“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严林之后,长乐人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的理论家。他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直接促成了此后几年文坛上小诗流行,他还是最早翻译引进俄罗斯文学、印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学者之一。此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他还提出了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他既是‘五四’之后新的文艺观的引人瞩目的倡导者,也是对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的‘文学统一观’和翻译文学思想,他率先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和主张超越过度疑古的‘古史新辨’尝试,他强调文学以‘真’为骨和提倡‘血和泪的文学’,都在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中留下独特的印记。”著述之外,郑振铎在文学编辑和文学史著述方面成果丰厚。他继承了严复文学进化的观念,《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和俗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④

综合来看,世纪之交的那个年代,福建文坛群星璀璨,严复、林纾、辜鸿铭、林语堂、郑振铎、林徽因、冰心等一批闽籍学者以其翻译、创作和文论积极参与了救亡图存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引领了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转向。

及至当代,福建仍然延续了在文论上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闽派批评家在文坛上的群体性出场,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革

新等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形成“闽派”“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势。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网刊文称:“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⑮。无怪乎徐杰舜在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专列一节讨论“福建文论文化”,称“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福建的文论具有鼎足的地位”,是“华南汉族文化的一道彩虹”^⑯。

注释:

[明]黄仲昭纂修:《八闽通志》卷四十六“选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景成林:《宋前文人入闽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页。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曾大兴:《柳永以赋为词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

王学泰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第五卷《明代文学》,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2页。

刘绍智:《谢肇淛评金瓶梅》,《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杜书瀛、钱竞主编,钱竞、王飏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220页。

杜书瀛、钱竞主编,钱竞、王飏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严几道:《严侯官文集》,光绪癸卯二年印,第71、65页。

杜书瀛、钱竞主编,钱竞、王飏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256页。

① 李贽:《焚书·童心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② 杜书瀛、钱竞主编,钱竞、王飏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296页。

③ 林纾:《〈贼史〉序》,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陈平原、夏晓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杨义、邵宁宁:《献身中国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⑤ 周荣:《粤派批评:在构建传统的过程中保持开放性》,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118/c403994-29771296.html>,2018年1月18日。

⑥ 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49页。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李倩)